

“文化大革命”，郑准泽说：中国搞了破坏朝中关系的活动，但是朝鲜对那些不合理的举动没有做出反应，因为当时维护两国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¹⁷³ 10月8日朴成哲访苏时也对勃列日涅夫说，中朝两国的国家关系已经恢复，经贸合作也有所发展，但是两党关系还不正常，与中国党会谈时不像与苏联党那样可以“开诚布公”。¹⁷⁴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时，又给中朝关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第二节 中美和解对中朝关系的影响

被基辛格称为一场“外交革命”的中美和解及其关系正常化，是冷战时期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其影响之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过程看，中美关系的解冻不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更涉及中、美、苏大国三角关系以及中美各自盟友的利益和安全；第二，从结果看，中美关系正常化影响到一系列地区和国家，他们都不得不调整自己对美国和（或）中国的政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学者们讨论了中美和解过程中的苏联问题、日本问题、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¹⁷⁵ 但笔者也注意到，其中涉及朝鲜问题及此事对中朝关系影响的讨论并不多见。¹⁷⁶

笔者主要利用中美双边档案并辅以韩国及东欧国家的资料，重点考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中朝关系的状况：在调整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中国对朝鲜问题的立场、态度和处理方式如何，中国是怎样维护朝鲜利益并保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的，此期中朝之间有哪些共同利益，又存在哪些潜在分歧，中美关系出现的转机对中朝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背景

1969年尼克松执政伊始，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动荡和不安的世界，美国外交陷入重重困难。首先是其劲敌苏联的发展来势凶猛。尽管苏联的实力在很多方面不如美国，但在远程导弹能力方面已与美国基本达到平衡。自从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克里姆林宫显得信心十足，而美国及其盟国的温和反应则表明，西方似乎已经认可苏联在东欧可以任意使用武力保护其阵营的稳固。此外，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以后，苏联继续支持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试图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其势力显然已经延伸到中东欧之外。¹⁷⁷

其次是与欧、日盟国的关系矛盾重重。欧洲盟国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持久性战争很不满意，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欧洲之行期间，法国总统戴高乐对此就有明确表态。联邦德国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更使美国感到担忧，1969年9月上台的总理勃兰特极力谋求与苏联集团改善关系，将北约联合一致对苏的政策推向危机。除了政治问题外，欧洲一体化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面临严重挑战。¹⁷⁸

中国也是一个令白宫十分头痛的问题。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明白中国国内的变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一方面，中国大力援助北越，并严厉指责美国对南越的支持，“十亿手持原子弹的中国人”的威胁就在眼前；另一方面，“文革”的内乱似乎又大大削弱了中国直接出兵越南作战的可能性。此外，珍宝岛冲突使紧张的中苏关系达到冰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实难预料。¹⁷⁹

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1968年2月越南南方爱国武装力量发动的春节攻势表明，约翰逊政府有关敌人将很快

被打垮、战争即将结束的许诺完全是不现实的。迫于各方压力，白宫宣布部分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谋求进行和谈。越战无疑是约翰逊留给新一届美国政府最棘手的难题。¹⁸⁰

面对巨大的挑战，尼克松决定放弃过时的两极对抗体系，重建大国间的“均势”，并提出了建立以“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而实施这一方针的必要前提则是打开对苏缓和及对华关系的僵局。另一方面，在亚洲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地、体面地结束越战，为此也需要首先改善与中国的关系。¹⁸¹

同一时期，北京面临的国际困境丝毫不亚于美国。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并提出勃列日涅夫主义，立即使中国感到了其北部安全所受到的威胁，“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概念频繁见诸中国报刊就充分表明了这种担心。¹⁸²与此同时，中美在越南问题方面的对抗仍然很激烈。尽管尼克松在总统竞选期间承诺要结束越战，但他上台后，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空战却开始升级——尼克松希望以此胁迫河内在其任内第一年就范。¹⁸³1969年3月在珍宝岛发生的严重流血冲突，对于中国来说不啻“雪上加霜”。中苏两国已处于一场大战的边缘，甚至有传言说，苏联威胁要用核武器对付中国。¹⁸⁴此外，在东部沿海，除了日本和南朝鲜不断表现出来的敌意，中共还要警惕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从台湾发动的反攻。在西南边陲，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虽硝烟散去，但双边关系持续紧张，难免死灰复燃。1969年6月美国与柬埔寨建交，中国政府又开始对东南方的安全甚为担忧。¹⁸⁵可以说，从黑龙江到北部湾，从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中国简直就是“四面楚歌”，其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¹⁸⁶日益恶化的周边环境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调整外交政策。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并提出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国际问题，要李富春等对国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¹⁸⁷5月中旬，即珍宝岛冲突发生后，周恩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再次要求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7月11日，由陈毅等四人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交周恩来。报告详尽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不致轻易发生，判定目前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而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由此，报告勾勒出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国际战略格局。9月17日，在四位老帅提交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基础上，陈毅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并决定将此“不合常规”的想法口头报告周恩来。¹⁸⁸显然，对国际格局的这个分析与美国的看法大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后不久，毛泽东开展“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中美关系终于踏上了破冰之旅。

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朝鲜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1960年代末，朝美关系极为紧张，朝鲜对美、韩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进攻手段：从1967年5月到1968年1月，在美方控制的非军事区内，根据有关报道有超过300起敌对冲突，导致15名美国士兵丧生，65人受伤；¹⁸⁹1968年1月21日凌晨偷袭南朝鲜总统府；1968年1月23日抓获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1969年4月击落美国EC-121侦察机等，朝鲜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然而，金日成过激的举动除了招致美国加强在东北亚的海空力量、大幅度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以及朴正熙政府借此煽动起反共情绪外，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苏联和中国只是表示了道义上支持，却没有在军事或经济上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朝鲜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1971年4月12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以八点方案的形式提出了和平统一新纲领，主张美军撤出南朝鲜，废除韩美、韩日条约，通过大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作为过渡性措施可实施南北联邦制以及召开南北政治协商会议等。¹⁹⁰南北双方红十字会9月20日在板门店举行首次会谈，解决离散家庭取得联系的问题，并实现了南北分裂之后的第一

次直通电话联系。¹⁹¹ 在这种情况下，从逻辑上讲，中美关系在长期敌对后出现的转机，也为朝鲜改善与南方及美国的关系，提升其国际地位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

实际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和平壤之间相互激烈指责的时候，毛泽东和金日成也不愿意看到双方关系彻底遭到破坏。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中朝双方都感到有必要言归于好。¹⁹² 中朝关系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已经走出低谷，恢复正常。

不过，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年代，中美关系和解毕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同美国的盟友感受震动一样，中国昔日的“兄弟”也受到强烈刺激。在中美这对昔日的敌手发现双方外交和安全利益契合点的同时，在客观上必然造成中朝之间外交方针的分歧。对此，中国领导人必须极力弥合裂缝。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后，周恩来立即向中国当时仅存的三个盟友进行了通报和解释。消息传来，越南领导人对中方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从此逐渐倒向苏联。¹⁹³ 越南驻华使馆正式向中国政府建议，以后不要安排在华实习的越南学生观看涉及美国人访华的影片。¹⁹⁴ 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则致信中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勾结”，指责中国这一做法是“机会主义”。¹⁹⁵ 那么，朝鲜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这种妥协呢？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关系解冻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处理朝鲜问题的？

二、中美外交谈判中的朝鲜问题

实际上，在与美国进行的频繁外交谈判中，除了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中国领导人始终也没有忘记其东北亚的唯一盟友——朝鲜。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此前（7月4日），在周恩来报送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中美预备性会谈

中几个关键问题》中，便提出了美国从南朝鲜撤军的问题。¹⁹⁶在第一次会见时，周恩来对基辛格说：“你们在南朝鲜有驻军，南朝鲜也向南越派了军队。因此，如果你们撤军，南朝鲜在越南的军队也要撤出，……你们驻南朝鲜的军队也要撤出。”谈到朝鲜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坚持：“所有外国军队必须从其他国家的领土撤出；让那些国家的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对此，基辛格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进一步表示，“坦率地讲，我认为朝鲜问题不会干扰我们太长时间。我相信朝鲜正在发生政治性变革，问题将得到解决。美国在南朝鲜驻军不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尼克松总统也许可与您讨论撤军的具体时间”。¹⁹⁷当周恩来提到美军撤出半岛后日本军队可能进入时，基辛格表示，“这绝对违背尼克松总统关于决不允许日本军队扩军到其本土之外的政策”。针对周恩来所说南北朝鲜之间只有一个停战协定，北朝鲜对美国驻军感到不安，基辛格回应：“我们反对南朝鲜对北朝鲜的军事进攻。……如果你们能利用你们对北朝鲜的影响力，告诫北朝鲜不要向美国和南朝鲜发动进攻，这将有利于亚洲和平。”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示异议。¹⁹⁸

显然，在此多事之秋，中美双方都希望朝鲜半岛能够保持稳定的局面，这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然而对于朝鲜来说，正如金日成在1970年11月2日所说：“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无耻的侵略者和掠夺者，是世界所有进步人民的头号敌人。”¹⁹⁹所以，虽然中美会谈的“主题”不是朝鲜问题，²⁰⁰周恩来也没有事先把基辛格来华的消息告知正在北京的朝鲜代表团，但在会谈中周还是主动提出了朝鲜和平统一方案中的第一点要求。这就充分证明了周恩来此后不久对金日成做出的保证：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中国不会放弃原则，也不会损害盟友的利益。

中美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先于7月13日前往河内进行通报，接着马不停蹄地回到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最后又赶往平壤。与阿尔巴尼亚和越南坚决反对的强硬态度不同，金日成考虑的是中美关系缓和会给朝鲜带来什么利益。在7月15日的两次会晤中，周恩来向金日成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通报。周恩来强调，中国原来的主张没有改变，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中国寄希望于美国人民。金日成虽然当即表示赞同，但还是流露出吃惊和不安。他说：尼克松访华，对朝鲜是个新问题，朝鲜劳动党将对人民进行解释。²⁰¹然而，朝鲜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妥协的必要性——中美关系缓和可能是他们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按照自己的方式统一朝鲜半岛的一个契机。²⁰²

1971年7月30日，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朝鲜派出内阁副首相金一访华，与周恩来进行了深入会谈。金一表示，朝鲜劳动党充分理解中美会谈的举动，认为这对推动世界革命极为有利，并坚信中国党的反帝立场不会改变。同时，希望中国向美方转达朝方的八点主张，核心内容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立即停止向南朝鲜提供核武器、导弹及其他各种类型武器；解散美韩联军；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朝鲜代表应无条件参加。周恩来答应在基辛格访华时，向美方转达这些要求。²⁰³在8月9日欢迎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强调：“中朝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和兄弟。”²⁰⁴这显然是在公开场合对朝鲜做出安慰和承诺。

不仅如此，中国还立即采取了实际行动。1971年8月18日至9月7日，由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一行26人应邀再次访华。中朝双方先后举行了两次总会谈，还就海军、空军、军械车辆、装甲、通信、外经、外贸等方面的问题举行了分组会谈。9月6日，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在北京签字。随后，朝鲜另一

个29人的军事考察团来华，分组参观考察了分布全国各地的十几个兵工厂。²⁰⁵《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中朝签署无偿军事援助协定的消息，这还是第一次，表明中国政府不仅要让美国明白自己对朝鲜问题的立场，同时希望平壤放心——中美关系变化不会危及朝鲜的安全，以使中朝双方能够在对外政策趋向缓和方面进一步靠拢。正如基辛格后来对尼克松所说，“毫无疑问，中国人已经做好了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以便促使金日成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变得温和一些”。²⁰⁶

中国的保证无疑增强了朝鲜的信心，没等中美正式接触，金日成便抢先采取了行动。1971年9月12日，朝鲜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议程中必须列入两项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内容，即美军撤出南朝鲜和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因为这是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重要先决条件”。²⁰⁷显然，金日成企望中美接触可以推动国际社会重视朝鲜问题，同时提升朝鲜的国际地位。从八点方案到两项要求，朝鲜的目标更加明确，也更加具体了，这实际上也是直接向美国传递的信息。对此，《人民日报》立即发表评论员文章给予坚决支持。²⁰⁸可惜，时机尚未成熟。9月25日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朝鲜问题推迟一年再行讨论。²⁰⁹联合国的入门没有敲开，中美谈判对解决朝鲜问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1971年9月25日、10月8日，金日成同日本《朝日新闻》和共同社记者进行谈话，公开表明朝鲜对中美关系突如其来转变的态度。在这两次谈话中，金日成表达了四层意思：朝鲜采取的是自主的对外政策，不会受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朝美关系的变化取决于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尼克松访华“不是胜利者的挺进，而是失败者的跋涉”，是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困境的表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是敌对的矛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能进行妥协；如果中美对话能够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一件

好事，朝鲜并不打算推行背道而驰的政策，但要警惕美国的两手策略。²¹⁰ 金日成赶在基辛格到达北京之前发表的这些谈话，既是向美国表明立场——希望美国也能同朝鲜直接对话，也是向中国施加压力——以防中国把朝鲜的利益当作筹码。

1971年10月20—26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与周恩来会晤10次，共23小时40分钟，主要是讨论和确定尼克松访华时中美联合公报的文字。²¹¹ 回国后基辛格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关于这次会谈的详细报告，其中有关朝鲜问题的内容如下：周恩来多次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在事关自己直接利益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上等待，但是关乎中国小盟友的问题，如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是最要紧的。在对待盟友的利益方面，中国是不会慷他人之慨的。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实质性问题，周恩来称台湾问题是最关键的，印度支那问题是最紧要的，朝鲜问题位列第三。不过，与7月的初次会谈相比，周恩来把朝鲜问题看得更加重要，提出双方有责任解决这个1954年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周恩来转交了1971年4月朝鲜政府的八点声明后，基辛格阐明了美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美国准备与相关方面讨论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永久法律基础，但不会对一个可能使南北朝鲜敌对冲突再起的方案感兴趣。对此，周恩来强调，中国对给予南北朝鲜平等地位的问题感兴趣，至于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可留到未来解决。基辛格认为，在讨论结束时，周恩来事实上接受了美方的立场，即解决朝鲜问题尚待时日，在朝鲜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中美双方可先交换意见。基辛格明确表示，朝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北朝鲜的克制。周恩来则回应，这一切都是相互的，中美双方都要利用自己对盟友的影响，防止他们采取军事行动。至于相关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如何措辞，确定了中美双方各自表述的原则。²¹² 由此看来，中国的立场是清楚的：在原

则上支持和维护朝鲜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的方案及要求，但朝鲜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需要长期努力的。

金日成想尽快知道中美会谈的结果，也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10月25日）后国际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感兴趣，更想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改善朝鲜国际地位及南北对话的问题。因此，基辛格刚一离开中国，金日成立即于11月1—3日秘密访问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²¹³关于这次会谈的档案材料目前尚未解密，不过金日成回国后的讲话或许反映了他的感受。在12月2日对党内干部的演说中，金日成除了重复他此前关于“失败者的访问”的说法，又特别指出：对于即将到来的尼克松访华，“没有任何理由神经过敏或责难中国”。“长期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因尼克松去访问而抛弃革命或做出违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事情”。²¹⁴看来，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似乎给金日成吃了一颗定心丸。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在给尼克松总统的书面报告中，黑格写道，“周总理在会谈结束时指出，越南的情况与朝鲜不同。朝鲜问题，他本人涉及很多，可以与美国人谈并达成协议”。²¹⁵周恩来的表态说明，在中国看来，与越南的抵制态度不同，金日成不反对中国与美国接触，而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也有信心。

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和美国总统也讨论了朝鲜问题。周恩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了解总统的想法。总统也了解我们的想法。总统的官方立场是美国准备将来最终从朝鲜半岛撤军，并阻止日本军队进入南朝鲜，因为这将有利于远东的和平。至于说如何促进南北接触，如何推动和平统一，这个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尼克松在抱怨“南北朝鲜人都极端感情用事”后表

示，希望中美两国分别对朝鲜北方和南方施加压力，以防他们发生冲突，把大国拖进去。²¹⁶ 2月27日签署的《联合公报》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中方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美方声明：美国将保持与韩国的密切联系，支持韩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²¹⁷ 中国在声明中单独列出取消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一项，很可能是在谈判后认为，与要求美国撤军相比，实现这一目标更有把握。

3月3日，周恩来接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单位负责人，对中美联合声明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谈到朝鲜问题，周恩来说，对朝鲜的八点方案，“我们一向是支持的”，至于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本来是要在二十六届联大解决的，因为当时南北朝鲜红十字会正在接触，所以联大没有讨论”。中方几次说到，“不取消这个委员会，就等于是对朝、中的侵略”。美国意识到中国对此不满，也感到这个委员会搞得不好，所以表示“可能在二十七届或二十八届联大把它搞掉”。美国对朝鲜“是采取守势”。关于第四点声明，周恩来说，写上这一条（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和谅解），是为了“使印支三国和朝鲜放心”。²¹⁸

3月4日，即在中方向平壤进行通报前，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承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件好事”。同时强调，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孤立政策遭到了总破产”。谈到中方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社论指出，“这是兄弟的中国人民对于我国人民迫使美帝撤出南朝鲜，争取实现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的强大支持”。随后，社论用大量篇幅重申了朝鲜政府的主张，谴责美国在声明中闭口不谈撤出美军和解散韩国统一复兴

委员会的问题，还特别提出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挫败日本企图重新征服亚洲的扩张野心。²¹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大量发表朝鲜的报刊文章，却唯独没有转载这篇社论。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可能看出来，朝鲜对中美《联合公报》没有提美军撤出南朝鲜一事感到不满意。

3月7日，周恩来再次专程去平壤，向金日成介绍中美《联合公报》的商谈经过。周恩来指出，中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是“最全面的”，关键是取消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美方本来有一个美韩条约问题，由于中方坚决反对把美蒋条约写进《公报》，所以美国连美韩、美日条约也不提了。或许是考虑到《劳动新闻》社论中大讲日本对朝鲜的威胁，而《联合公报》中对此却只字未提，周恩来不无用意地说道：会谈中尼克松还表示，不让日本进入台湾，也不支持日本进入南朝鲜，这就等于是一个默契。关于第四点声明，周恩来解释说，这是美方主动提出来的，中方则向美方说明：“不代表第三方”同样适用于朝鲜，但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中国与朝鲜还同为一方。金日成对中国在中美会谈中对朝鲜问题给予特别关心，再次表示感谢。²²⁰

据民主德国驻朝鲜外交官的观察，朝鲜领导人对尼克松访华的结果很满意，特别是在公报中提及中方支持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朝鲜领导人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立场坚定。《劳动新闻》几乎全文刊登了上海公报，仅做了极少字句的删节。²²¹ 苏联有关机构在一份报告中则指出，朝鲜舆论对中美首脑会谈和联合公报的高度评价，“一定是受到了北京领导人的影响”，“北京显然是成功说服了朝鲜领导人”。而朝鲜报刊“绝非偶然”地强调，尼克松访华的结果之一是：朴正熙像蒋介石一样，“都被他们的老板给出卖了”。²²² 中国的确时刻也没有忘记维护自己盟友的利益，而中美外交谈判的结果也的确为朝鲜带来了实际利益。